



回归后的香港文学

——以《香港文学》说开去 □赵稀方

“九七”回归,香港的历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。这种变化,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就已经开始了。1978年来中国进入新时期,1979年中美建交,特别是1984年“中英联合声明”,这三件事改变了香港的历史,香港的文化也随之改变。

1949年以后,香港文化的基本结构是美元文化、左翼文化及现代主义三分天下。20世纪70年代,深化为右翼文化、左翼文学和本土文化三个部分。70年代末期以来,这种结构被打破了。中美建交、冷战结束,意味着美元文化的结束,而随着香港即将回归祖国,左翼文化逐渐成为主流。

20世纪80年代前后,香港的文艺期刊境况趋于恶化。黄傲云惊叹:“1984年底,香港的文学,又是否已经走向灭亡?1984年的结束,看起来像香港的文学或香港文学,已经结束。”香港的文学环境不好,纯文艺刊物不容易存活,这是一个老问题,但为什么会在进入80年代以后,香港文学刊物忽然出现集体崩盘?这其中自有历史原因。香港的历史发生了转折,既往的文化格局也出现了变化。徐速的《当代文艺》在1979年结束,刊物《海洋文艺》在1980年中止,均并非偶然;作家阮朗和徐速于1981年去世,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。香港回归祖国指日可待,新的时代即将开始。

1985年《香港文学》创刊,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。《香港文学》没有延续从《文艺世界》到《海洋文艺》的传统思想,而是另起炉灶,总揽全局。《香港文学》是内地出资的,邀请刘以鬯任主编,即露出几分端倪。当时的社会形势出现变化,《香港文学》的任务变化成为团结香港各路作家,刘以鬯是香港文坛元老,适合于调停。《香港文学》的发刊词,第一强调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,第二强调《香港文学》不是代表某个个人或党派,而是代表整个香港,第三强调香港文学可以在沟通中西、联络华文文学方面担当特殊作用。这三点,奠定了香港文学的发展方向。

其实早在1980年9月14日,《新晚报》就主办“香港文学三十年座谈会”,第一次将不同派别的文人聚集一堂,如黄思聘、徐速都有公开发言,“打破了左右翼文化人多年不公开交流的局面”。当然,这还只是一次座谈会。到了1985年,《香港文学》第一次有条件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平台上,这在香港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

《香港文学》一亮相就出人意料,上面居然出现了力匡、黄崖和慕容羽军等作家的名字,李英豪、戴天、叶维廉和杨际光等现代主义作家也赫然在列,这对于一个内地出资的刊物来说有点不可思议。这说明,《香港文学》已经与从前的刊物完全不一样了,在香港回归大势已定的情形下,它的任务不再是坚守某个派系,而是团结各方。1986年后,伯伦、何达、夏易、舒城等文人也陆续登上《香港文学》。

中年作家群也是兼收并蓄。60年代末期以后的香港诗坛,大致以《盘古》为先导,其后分化出《大拇指》—《素叶》派、“《诗风》—《诗网络》”派以及《海洋文艺》新左翼作家三种主要派别,代表着现代主义、古典主义及写实主义三种不同风格。不出意料的是,《香港文学》将这三派的作家,都集中到《香港文学》这个阵地上。

“九七”之后,《香港文学》主编由陶然担任(2000年第9期,总189期),他保持了刘以鬯所建立的综合传统。2018年,周洁茹继任《香港文学》总编,继续坚持了刘以鬯和陶然的编辑理念。“九七”之后,老作家陆续退出文坛,中年作家担当大任,最活跃的是新生代作家。周洁茹主编期间,则已经开始推出“90后”甚至“00后”作家,说明香港文学后继有人。

在前辈作家中,昆南在“九七”后依然表现不凡。昆南是50年代以来香港现代主义运动元老,他在1963年《好望角》停刊后退出了文坛。《香港文学》创刊后,特别是陶然接编后,昆南复出,发表了大量作品。昆南复出后,小说多于诗歌,文风激烈,语言的混杂也一如既往。不过他在文风上的变化也相当明显,后来主要表现个人历史与情欲的错置。

中年作家中,西西是最具生产能力的。西西1979年出版的《我城》,已经成为香港的象征。1979年和1980年,她创办的素叶出版社和《素叶文学》杂志,成为香港本土文学的主要阵地。其实,在《香港文学》初创的时候,西西就积极发表各种文类,也深得刘以鬯欣赏。没想到,1995—1996年发生了刘以鬯批评艺展局资助西西《飞毡》的事件,导致西西不再给《香港文学》写稿。但2000年后,陶然接编《香港文学》,西西又开始创作大量不同类型的作品。除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外,西西还出版了《飞毡》《我的乔治亚》《缝熊志》,2019年她更是出版“天工开物”式长篇小说《钦天监》,并获得“花踪文学奖”等各种奖项。

1997年之后,香港文坛最活跃的无疑是香港新生代优秀作家,当然他们今天已经不再年轻了。新生代没有什么历史包袱,他们致力于文学革新,创造了香港文学的先锋姿态,这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董启章和葛亮。董启章是香港文学最有影响力的年轻作家之一,他前期以《永盛街兴衰史》(1995)和《地图集: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》(1997)出名。后来很多小说都先在《香港文学》发表,如《体育时期》《天工开物》等。他已经走出了以人物和故事为主的传统小说世界,而是从人走向物,以物体指涉历史,以文字的象征系统对抗经验现实。

葛亮系新的内地南来作家,他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,2000年去香港继续深造,博士毕业留在香港工作。2005年10月,他以《黑白套印的城》第一次登上《香港文学》,此后他把写香港的小说编成了小说集《浣熊》。葛亮观察香港的视角,聚集在“新香港人”的身上,作者关心这些外来者如何在香港落脚,如何融入这个城市。葛亮写香港的小说,精练而典雅,应该受到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及当代侦探小说的影响。不过,葛亮真正的力作,却仍然是写内地的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北鸢》一枝独秀,获得诸多殊荣。这也说明,香港的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的关注仍有差别。

当然,香港也有不在《香港文学》发表作品的作家,其中较有成绩的有陈冠中和黄碧云。陈冠中在1976年创办香港《号外》杂志,虽然从70年代开始创作,1978年出版《太阳膏的梦》,但正式大量生产小说却是“九七”后的事情,“香港三部曲”的后两部《什么都没有发生》《金都茶餐厅》分别出版于1999年与2003年。陈冠中笔下的香港,体现出更多元的面貌。《太阳膏的梦》中宋家聪表现出颓废的波希米亚精神,后两部小说则分别体现出专业经理人跨国的时空和杂交文化。

黄碧云早年以《失城》出名,后来她希望为香港写史。小说《烈女图》以“我婆”“我母”“你”三代女性的家世,作为香港历史的隐喻。《烈女传》则试图替底层发言,小说刻意减低故事性,然而却突出物质性,不厌其烦地详细描绘香港的地名、街道、器物、用具、风俗等等。在语言上,《烈女传》继承了高尔基的三及第写作传统,白话与粤语的结合,阅读不显然而真实。《烈女传》在2014年获得“红楼梦奖”,名噪一时。

除香港本土作家及南来作家之外,海外华人作家也常常在香港发表作品。刘以鬯主编期间,《香港文学》就刊登了多种海外华文学的专辑。“九七”之后,情况有所不同,香港作家从50年代开始就“出口”海外,他们转化了身份,但他们持续在香港发表作品,成为了香港文坛的一个特殊部分,其中有叶维廉、杨际光、卢因、陈浩泉、蓬草、绿骑士、黎翠华、梁羽生等。此后,大量活跃作家都愿意在《香港文学》发表作品,林海音、王鼎钧、非马、张翎、赵淑侠、朵拉、苏炜、喻丽清、聂华苓、洛夫、尤今、刘荒田、黎紫书、张错、钟怡文、痖弦、陈谦、骆以军、许世旭、章平、袁宪等人分别在《香港文学》上出过专辑。

香港原是英国殖民统治地区,外来文化主要体现为盎格鲁萨克逊文化,海外华文学带来了世界各地文化,使得香港文学的文化混合更加繁复,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交错形态,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。

还需要提到的是,“九七”后的香港文学研究也成绩斐然。刘以鬯深具文学史意识,自执掌《香港文学》以来,刘以鬯就有意识地约请过去香港报刊的主持者回顾历史,也约请专家进行报刊和文学史研究,其规模之大,堪称前所未有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从《香港文学》开始,香港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才真正开始建立。

就研究而言,内地学者撰写了不少《香港文学史》,但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至“九七”达到高潮。与此同时,香港本地却一直未能出现一部香港文学史。看起来,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似乎较内地落后,其实不然。香港之所以没有出现香港文学史,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觉得资料积累还不够,火候未到。在内地学者大量撰写《香港文学史》的时候,香港学者一直在默默进行基础资料积累。“九七”之后,这些资料逐渐面世,显露峥嵘。这其中较

具贡献的,是郑树森、黄继持、卢玮銮主编的一系列“资料选”“作品选”和“年表”,包括《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》(1998)、《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》(1998)、《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(1945—1949)》(1999)、《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(1945—1949)》(1999)、《香港新文学年表(1950—1969)》(2000)等。卢玮銮等还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学报刊原文及目录面世。这些基础工作,无疑是研究香港文学史的必要准备。

引人瞩目的是近年面世的由陈国球教授主编的12卷《香港文学大系》,这套“大系”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初步完成了对于香港文学史整理和定位。陈国球对于香港文学史的建构,与各种中国新文学大系都有所不同。除小说卷、散文卷、戏剧卷、史料卷以外,多出了“通俗文学卷”和“旧体文学卷”,少了“文学论争卷”,这是很让人瞩目的现象。由于殖民地香港的历史独特性,在香港中文文学中,新文学与旧文学兼容,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并行,其间并无根本性矛盾,也无争议冲突,这是香港文学有“旧体文学卷”和“通俗文学卷”而无“文学论争卷”的原因。内地学者简单套用中国新文学史模式,必然产生盲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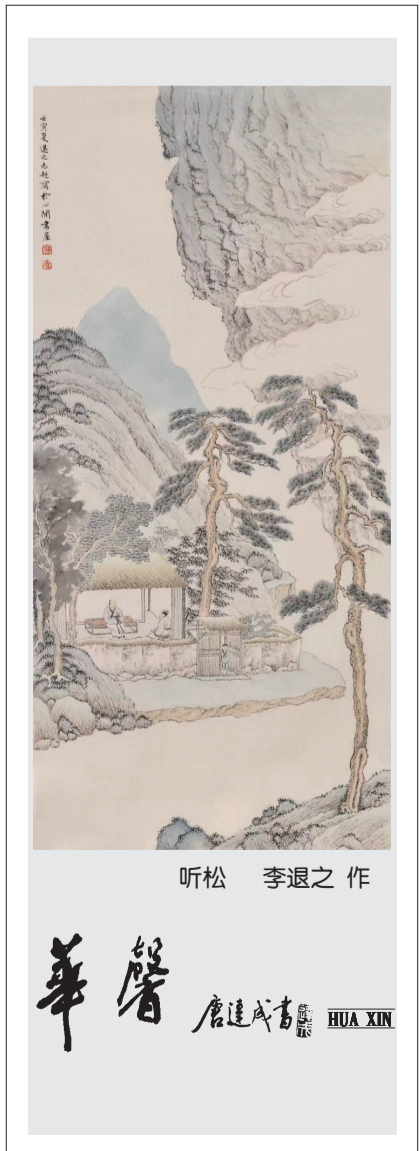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香港的回归,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。新时期以来,香港电影和音乐在内地风生水起,在文学上除了金庸小说有较多读者外,交流却不多。这种状况正在改变,近年来内地开始关注出版香港文学作品。2010年,作家出版社与世界混合出版公司分别推出董启章的代表作《体育时期》和《天工开物·栩栩如真》。2016年1月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“西西系列”——《飞毡》《手卷》《胡子有脸》等。202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《哨鹿》《我的乔治亚》。2017年7月,花城出版社接力推出“香港文学新动力”丛书。香港文学作品,逐步被内地读者所熟悉。当然,这一点做得还远远不够。

2019年2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,从此香港正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,香港与内地的交流,从此得到进一步加强。2019年6月24日,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在广州开幕,主题为“湾区花正开”。香港与内地及澳门原来就是一体的,属于粤文化的一个部分。据《小说星期刊》,20世纪20年代广州、香港和澳门之间文化交流甚多,关关在《天涯吟诗序》中曾描绘过诗人“出澳入港,虎啸风腾,龙起云从”的场景,由此可见,当年三地之间文人唱和盛极一时。如今,粤港澳三地文化融合前景可期。(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)



华铃:华人诗坛不该忘记的诗人

□韦 泱



华铃这个名字,似乎很陌生了。他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求学、写诗,1952年回到澳门定居。今年,值华铃先生辞世30周年,海内外华人诗坛当不应淡忘他。

华铃(1915—1992),祖籍广东,生于澳门,原名冯锦钊,1936年就读上海复旦大学,后转入暨南大学外文系。20世纪30年代上海沦陷后的“孤岛时期”,是他诗歌创作最活跃的时期。他与大学同学吴岩等一起,合办《文艺》月刊,诗歌在《文艺新潮》《大英晚报》等发表甚多。

在暨大,华铃遇到了伯乐,文学评论家、翻译家李健吾老师。在李健吾的眼中,华铃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年轻人,个子不高,但是筋骨壮健,他的诗,流畅而有节奏。独自住在亭子间,浸沉在他的寂寞和心里面。在众多的学生中,李健吾独爱华铃这一个。李健吾常常邀华铃到宿舍里来谈心,也不时去亭子间看望他。华铃是感情奔放的诗人,遇到知音,就情不自禁地诉说着自己的创作甘苦。吴岩曾在《怀念华铃》一文中说他“几乎天天写诗,天天谈诗”。而老师李健吾总是耐心地听着,有时谈一些自己的想法,自己的写作体会,与之互相交流。不仅从具体的一首诗的字句安排,更是从诗人的创作方向和理念上,给华铃许多切实的帮助,还写了《华铃诗人论》,刊登在香港《星岛日报》叶灵凤主编的“星座”副刊上。1939年华铃毕业准备南下时,李健吾写了许多封信让他带着,把他介绍给朱自清、杨振声、陈梦家、沈从文、孙毓棠等文学界好友。华铃在重庆、广州、桂林、昆明等地执教,到1948年回到澳门定居并任教。虽然南北相隔千里,师生依然保持着通信联系。抗战胜利后,李健吾与

郑振铎在上海创办《文艺复兴》杂志,约华铃为刊物写稿,先后有诗歌《再也无心跋涉》,翻译独幕剧《遗忘了的灵魂》等,在《文艺复兴》上发表。全国胜利后,由于多种复杂原因,他们的联系被迫中断了。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,华铃的弟弟冯锦海得知李健吾还健在,想方设法联系上居住在北京的李健吾,把华铃的澳门地址写信告诉他,师生才得以重新联系,通信频频。知道老师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,华铃从海外给他寄各种贵重药品,以利医治。有感于老师病中念念不忘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,却苦于资料的匮乏,华铃就跑到澳门的各家书店,还发动几个子女,从香港、维也纳甚至法国,四处访问寄给老师,使晚年的李健吾能完成并整理自己的戏剧创作集,以及翻译出版《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》《现实主义论文集》等。本来,华铃计划1982年8月北上看望老师,因故推迟出行,不料11月李健吾病逝,美好愿望终成千古遗憾。

上世纪30年代,在已沦为孤岛的上海,华铃白天上学,晚上躲进亭子间,以诗歌抒发激愤的心情,接连写了数百首诗,把它们编为六册,即《玫瑰》《向日葵》《牵牛花》《满天星》《勿忘依》《昙花》,以自费出版的形式印梓(后两册因故没有印出),由五洲书报社发行,邮购处是他的住宅:“静安寺路蝶来新邨四十一号”。我手头的这册《牵牛花》出版于1939年6月,共分两辑,第一辑诗十首,第二辑诗六首,难得的是,诗集后面有较长的一篇《后记》,开头就说:“几番因为不得已的延期推迟了出版的日子,这是应当向读者,尤其是一班预约定户道歉的。《玫瑰》《向日葵》出版后,颇得到各方面不少的好意批评,其中口头的居多,书面的也

有,有笼统的,有具体的,有大有小,彼此之间意见又有相同的和正相谬的,不一而足,现在我约略举出来,让大家讨论讨论。”接着作者用了很大篇幅,把各方的意见作了归纳,其中不乏文坛名家如锡金、王统照、许幸之等。最后说:“亲爱的先生、朋友、读者们,我懂得你们的盛情,我只准备着倾听,倾听你们热情的倾吐。”

此书品相还好,我已忘了淘于何处,诗集的封面简洁醒目,上有作者的签名:“沪东中学图书馆存 华铃一九三九年七月”。别人签名大多在书内扉页,而他写在封面上,也是少见(曾见过聂绀弩有这种签法的)。



绍了华铃的诗歌创作和他所处的时代,同时首发傅玉兰编著的《至诚的呼声——华铃诗选》《时代的号角——华铃的生命乐章》两书。本来,我也不知道华铃为何许人。但我的两位前辈老师与华铃是至交老友,年逾百岁的作家欧阳文彬与文史学者陈梦熊先生,他们与华铃一直保持通信联系。我手头的三四封书信,就是华铃写给他们的,满纸充盈一个诗人火一样的热情。尤其是陈梦熊先生,把华铃的诗列入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作品集》丛书,由已故海外华人文学史家钦鸿先生编辑,书名叫《火花集》,华铃暨南大学的老师,诗人、翻译家孙大雨为诗集题了书名。这是华铃晚年十分看重的一部诗集,他把李健吾的《华铃诗人论》作为序言,又把昔年文友陈汝惠、许光锐的文章作为附录。钦鸿在《编后记》中说:“华铃的诗,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,但他所刻意追求的那种质朴的美,那种自然的美,那种真诚的美,却足以打动同样真诚的读者。”陈汝惠说:“华铃生长在这一个非常时代,自然不能以吟咏风月为足,而时代色彩的浓厚,国恨家愁的悲愤,也容易见诸笔端了。郑振铎先生曾经称誉华铃的抗战诗为‘时代的号角’,我以为是恰如其分的。”